

取消行政评议推荐才能切断教辅利益链

管理或能影响学校的利益相关单位不能再组织编写教辅材料了。近日,教育部在其网站上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旨在切断这一饱受诟病的利益链条。(中国青年报2月25日)

近年来,教育部等部门为治理教辅乱象,花了不少工夫,可教辅的利益链,却一直难以斩断。那么,这一次,击中利益链的要害了吗?从表面上看,按通知要求,行政部门、负责实施考试命题、监测评价的单位不得组织编写学生有偿使用的同步练习册、寒暑假作业、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考试辅导类教辅材料,这就从“源头”上遏制了利益因素的干扰,可如果分析教辅利益链形成的逻辑,除了上述直接利益因素之外,诸多间接的利益因素干扰其实还很大程度存在。

上述要求,针对的对象是单位,那么,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个人编写教材,是否允许?按照通知,这部分人员是符合编写者的要求的——通知强调,“教辅材料的主要编写者必须具有相关学科教学经验和熟悉相关教材”。这部分人员的身份摆在那里,在目前的教育运行体系中,能摆脱利益影响吗?退一步说,就是不允许在职人员编写,从这些机构退休之后的人员,毫无疑问是可以编写的,他们人虽然离开了,可是,影响也继续存在,或者通过原来的同事、下属,也可施加影响。

目前教辅的利益链,“源头”其实是此次通知十分明确要求的“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办法”,通知对这一办法的描述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教辅材料使用的指导,组织成立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对进入本省中小学校的教辅材料进行评议,择优选出若干套进行公告。各地市教材选用委员会根据当地教育实际和教科书使用情况,按照教科书选用的程序,从本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按照这一办法,教辅通过“评议”之名,就有了进入校园由学校推荐、征订的合法地位。而且,通知为这种做法,开了一个合法的通道——“若学生自愿购买本地区推荐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学校可以统一代购,做好服务,不得从中牟利”。

在这一源头之下,纵使再强调“学生购买教辅材料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也难以避免在实际运作中,出现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教辅材料的现象。就是家长和学生对变相强制做法(比如教师布置教辅上的作业)有意见,进行举报,可如果教辅在推荐名单之列,有关部门是很难查处的。学校会解释,我们是按规定推荐,家长要不要是他们的自愿。

不难发现,“行政评议、学校推荐、自愿征订、学校代购”,这就是目前教辅的利益链,在行政力量的“呵护”下,“自愿”极有可能成为“被自愿”。在这种教辅管理模式中,教辅也成为统编教材之外行政机构的另一个势力范围。

取消这种行政评议,同时规定任何教辅材料不得通过学校推荐、征订,学生有需要,自行到书店购买,这才是彻底切断教辅利益链的做法。也就是说,教辅的出版、发行与购买,完全是市场行为,不需要行政过多的干预。至于教辅资料的质量,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的竞争促进出版机构、编写者重视质量,另一方面,行政机构可以按照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监督出版机构依法出版、发行。另外,从长远看,目前教辅市场的红火,与应试教育体系密切相关,而打破应试教育体系,正是政府部门应该作为之处,如果能切实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围绕科学学习的教辅,也就难以有那么大的市场。 丙奇

身边的禁令为何难以执行

据新华社报道,农贸市场免费赠送的超薄塑料袋,代售点里随便可买的“无名手机卡”,室内公共场所里赶不走的烟民……回顾有关部门制定颁布的“限塑令”、“禁烟令”、“手机实名制”等,有的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真正执行过,有的风光一时就渐渐乏人问津。

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禁令难以执行,并不令人意外。而一些政府部门出台限制性的政策,固然有环保、健康等良好的动机,但是,如果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常常就会碰上“软钉子”。

相对于这些禁令,习俗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或许更大。人们按照某种方式生活了很多年,要是一下子改变,很难。另外,习俗并不只是影响普通的民众,也同样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

或许不难想象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些本来应该负责查抄塑料袋的执法人员,其本人或家人去买菜的时候,又会坦然使用菜贩提供的塑料袋;一些本来应该负责落实禁烟令的执法人员,一旦脱下制服到了酒店,也照样吞云吐雾,旁若无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的一些生活习俗就是好的。从道理上来说,使用塑料袋很不环保,公共场合吸烟影响他人健康,也很不文明,这些或许应该归为“陋习”。不过,也要承认,即便是“陋习”也是“习俗”,改过来也非常困难,是不可能靠一纸禁令就让人成了“新人”。另外,如手机实名制、购刀实名制等“禁令”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一刀切”地执行,也缺乏社会认同。这样的禁令当然会遭遇民众的消极抵制。

更何况政府部门的执法力量有限,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也不高。如一些基层部门,食品安全这样的大事还抓不好,又怎么能奢望他们去管菜贩们是否使用塑料袋?手机实名制、禁烟令,也存在有令不行的问题,禁令出来了,却没有人去监督、执法。不管怎样,结果还是把实施禁令的责任推给了社会,要靠商家、消费者自觉执行。最终还是要看民众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这也再次表明,很多社会领域的治理本质上是依靠合作、认同,而不能单纯依靠禁止。人们在认同与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与法律,并进而改变习俗。

所以,政府部门要推动禁烟、限塑,比简单地出台相关禁令更应该做的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让民众了解室内公共场所吸烟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使用塑料袋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破坏。只要这些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同意实行这样的禁止类的法令,那么,执行起来恐怕也就不会那么困难。 寒梅

拆除户籍樊篱社会更显生机

拆除户籍樊篱,是人心所向,是时势所趋。

户籍樊篱的拆除,正在从乡镇走向县、市。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除了直辖市、副省级市和一些大城市,户籍这道隐形的硬性门槛会完全消失。当代中国所呈现的,将是城市到乡村,从东部到中西部自由流动的景象。

一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近日正式发布。从总体上看,基本取向是有序放宽。这一年里,各地纷纷出台相应政策并予施行,各地的户籍樊篱在悄然渐逝。这表明,拆除这道樊篱,是人心所向,是时势所趋。

这道几十年来阻隔人们流动的篱笆,终于从从严到宽,从紧到松,从实到名,不再是一种事实上的障碍。归根到底,这是国人不屈奋进的精神活力,是改革开放释放的经济力量。

曾几何时,多少农民背井离乡怀揣梦想执着地走进城市,城市在一边设障一边又离不开他们中逐步放开户籍的教条。而在经济的推动下,在需要人力资源全国范围内配置时,户口已不再是就业的硬性条件。实践总是孕育着创造,又总会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这在户籍问题上体现得如此鲜明。

樊篱没了,有没有本地户口,获得的待遇逐渐相同了,社会也就更显生机与活力。因为,市场开始发挥它配置资源的效率和能力,便于“人往高处走”,更使各地域间的资金、技术、管理、文化发生流动,并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无论是今日各地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还是当代社会进入深刻转型,都与户籍樊

篱由硬到软再到无分不开。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力量作用下,有些户籍拆除得甚至过猛,超越了发展阶段,这同样会对社会进步造成伤害。这种急于拆墙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对农民、农民工等利益的损害。有的地方用城镇户口等置换农民土地,农民进城后却无事可干。有的地方只求城镇化率,不注重城镇化质量。这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拔苗助长行为,过犹不及。

这正是国办通知对镇、县、市三级落户条件做出一定限制的原因所在。同时,通知还专门就保障农民土地权益、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作出规定。这无疑缓解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但如何确保他们的权益不受侵犯,如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还需要各地的忠实执行,严格监管。 克己

「盖章费」念歪了服务经

在遵义,各居委会收取“盖章费”已不是秘密。许多居民纷纷来电反映:他们在要求居委会出具有关证明或房产交易过程中,被辖区居委会索取“盖章费”。随后记者又采访了遵义汇川区大连路街道办事处和遵义市物价局,办事处表示收取盖章费的行为是违规的,而物价局目前并未给出明确答复。(《黔中早报》2月23日) 光明绘



医院广告措辞低俗

据《中国广播网》报道,25日,一条微博在网上被疯转。博主发布的照片显示,四川省德阳某民营医院的广告上面,有“让您怀上亲生孩子”几个大字。记者调查得知,该广告牌挂在德阳汽车站售票大厅售票窗口正上方的墙上。网友和乘客觉得其广告语“太雷人”,甚至有不尊重女性的嫌疑。 王铎绘



公款旅游被免职,为何有人喊冤

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长何旅华因公费旅游被免职。有公务员为他喊冤,称许多部门大运会后都曾组织外出旅游。(2月26日《羊城晚报》) 何旅华被免职,一点都不冤!借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被免去司法局局长一职,有据可依。既然如此,为何有人替其喊冤?表面看这是“物伤其类”的同情心在作祟,实际上折射出了多重问题。

一是,认为公款旅游是小事,是权力福利,大家都这样做,都在享受这种福利,而偏偏何旅华被处罚,有点倒霉。因为在一些地方,公款旅游确实成为一种潜规则,甚至是有公开的权利福利。二是,这些公务员养成了特权依赖,权力耻辱感在退化,没有起码的权力节制,这从反面证明了公款旅游被查处的几率少,被问责的力度小。

一些公务员一旦养成了特权依赖,他们挥霍公款就会不知收敛,甚至变本加厉,他们违纪违法时就会抱有侥幸心理,甚至不计后果。江西省某机关一位公务员曾透露,一个地级市每年组织的各类公

款出国(境)活动上百批次,名目五花八门,“指标内”可以出访的名义有考察、培训、指标不够,也可以招商引资、商务考察、对口交流等名义组团出去。如此种种,一再证明了不少数公务员缺乏对法律法规的起码尊重,这种特权依赖形成了潜规则,法律尊严不存。

不知道何旅华本人是否也在喊冤,或者自认倒霉,不管如何,监管部门都应该以此为契机,更严厉地整肃公款旅游乱象,捍卫法律法规尊严。 石川

“少女拒爱遭毁容”悲剧后的反思

合肥17岁少女周岩因拒绝同学陶汝坤求爱,被陶用打火机点油烧伤毁容。此事被曝光后,引发一场舆论风暴,陶汝坤及其身为官员的父母,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这起毁容案手段之残忍,确实骇人听闻,凶手尽管为未成年人,也依法应对其劣行进行严惩。现在,公众对此案的关注,大多聚焦于凶手官公子身份上。然而,如此简单地标签化解读,恐怕掩盖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少女拒爱遭毁容”案最值得反思的在于,少女被毁容前遭遇无休止的纠缠,为什么没能获得有效的保护,凶手因爱索不成而一步步走向丧心病狂,为何没能对他进行及时的制止。

太多血的事实告诉我们,类似这种校园恋爱纠纷,极易引发暴力事件,当恋人之间一方已不爱另一

方,而另一方仍然执迷不悟,往往会导悲剧的上演。上海青少年服务热线曾做过统计,男女生间恋爱纠纷是校园暴力事件的三大主要“元凶”之一。美国有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查称,15%的受访青少年表示自己曾遭受过暴力,曾被恋人施以言语、精神、身体等暴力行为对待,50%~80%的青少年表示知道其他青少年正面对恋爱暴力。

不过,虽然校园恋爱纠纷存在着高风险,并一次次铸成惨剧,相应的预防与干预机制却几乎一片空白,“少女拒爱遭毁容”一案为例,陶汝坤对周岩的纠缠和骚扰显然不止一两天,但长期以来,周岩只是一味躲避,周岩被迫转学、休学,其中,未见学校、心理咨询机构、青少年保护机构、公安部门的有效介入。

我们目前的教育,两性关系的教育属于缺失的一环,由此导致了许

多学生两性平等意识的缺乏,缺乏对异性的尊重,不知道理性去面对感情的挫折。我们的教育机构对于学生早恋采取回避的态度,学生遇到恋爱纠纷,往往不敢向外界求助,得不到相应的指导以及自我保护的提醒。

“少女拒爱遭毁容”一案,如果当恋爱纠纷发生时,家长、学校和其他机构能共同介入,对陶汝坤展开心理疏导,及时惩戒其不法行为,陶汝坤心中的暴力因子或许不难消除。如果在日常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我们能重视两性关系的指导,类似疯狂索爱之举也许会少一些,自我保护意识多一些,也可降低恋爱纠纷和暴力的发生几率。

一起毁容案,毁掉了两个正处花季的孩子,这样的教训让人痛心。建立针对青少年恋爱暴力的干预机制,教育部门难道不该有所行动吗? 思之

去年拍出2.2亿元天价的“汉代玉甗”,今年初被人以“汉时无甗”之史实,指为赝品,引发公众对鉴定师的能力与操守的空前质疑。近日媒体又报“汉代玉甗”源自江苏邳州一个仿古玉器作坊,是用明代材料组装。这个仿冒品被文物鉴定师鉴定为汉代奇物,估价一下子变成1.8亿元以上的宝物。

我们且推定相关鉴定师是“诚信行事”,他所认定的东西,对于他知识和经验认知范围内是“真实的”,那么,这个鉴定结果与实际物品如此相差万里,被一民间作坊手艺人所“骗”,只能说明鉴定师的水平真的不怎么样。

而同样是这几天的消息,或许可以把相关问题串联起来。鉴定大师徐邦达于2月23日去世,徐老曾为富春山居图验明正身。随着徐老的去世,鉴赏界被称为“三大家”的谢稚柳、启功和徐邦达均已作古。去年5月22日,另一位被视为考古界泰斗的徐莘荪也辞世,他生前曾质疑过“曹掾墓”。大师们的相继辞世,走一个就缺一个,一时难有人能替代。

古玩鉴定一般依两类法,或经验鉴定,或技术鉴定。技术鉴定对物品带来不可避免的创伤,所以一直流行的是“经验鉴定”,只有那些阅“物”无数的鉴定师,才能胜任这个角色。这一过度依赖“经验鉴定”模式的做法,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有阅历的人越有阅历,越有阅历的人越能获得扩充阅历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青黄不接。也就是说,技术鉴定的适当重视,才会打破权威人物垄断鉴定话语权的现象。

另一方面,我国民间十年古玩和艺术品“收藏热”,极大地推高了收藏品价格,使一部分做鉴定的,转而也做起收藏和文物买卖,变身成为收藏界“大佬”。十年收藏热,在没有培养起与市场相适应的专业人员数量之前,就使原有的队伍流失了一部分。而一些守着这一“清水”职业的人们,也越过鉴定“中立价值”,替人做“假鉴定”。目前中国法律并没有对“鉴定走花眼”以及拍卖行“知假卖假”等有严密的法律责任规定。去年鉴定和估价成24亿元的假“金缕玉衣”,就被人质疑为收藏人与鉴定师共同筹划的“骗局”,假金缕玉衣鉴定师出具的鉴定书,从银行里骗得7亿元人民币的庞大资金,按这一事件后续发展来看,鉴定师们并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

依我国的文物法,文物鉴定资格大多依身份而生,排斥民间鉴定大师,多数活跃于民间收藏市场的鉴定师没有成长和成名的空间。如要鉴定国家级的文物,只有故宫的官方鉴定师才有资格,而故宫官方鉴定师一般依名录上的文物来查待待检文物是否对应,一旦出土的文物不在名录之列,文物身份就成为一个问题。十年收藏热,也是文物出土热十年,大量不在名录上的文物的出土,不得不以“仿真”之名流到海外,经海外拍卖获得“身份”后,又流回国内市场。

“汉代玉甗”作假与鉴定大师作古,使我们越在迷乱的时候越没有了权威的指引,这一困境的解决,唯有靠鉴定人才队伍的建设。 慎独

美国高等教育界再曝丑闻。对美国北达科他州狄克森州立大学的审计报告发现,数百名不具备入学资格的外国学生被这所大学录取,并且在没有完成课程的情况下被授予学位。自2003年开始,狄克森州立大学410名拿到学位的外国学生中,只有10个人真正完成了所有必修课程。审计报告指出,这些外国学生大多数是中国,也有一些来自俄罗斯。

美国“文凭工厂”的主力消费者是中国人,这不是舞台上的荒诞剧,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知道,办假文凭在国内已是一门灰色产业,某些聪明人还把生意做到了国外,但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小说《围城》里方鸿渐所上的“克莱登大学”不但走到了现实中,而且呈产业化经营之势。两年前,“打工皇帝”唐俊被发学历中有猫腻,他所谓母校“西太平洋大学”是一所不需上课,只需提供相关履历、缴纳“学费”即可获取学位的“文凭工厂”。当时,善良的人们还以为这只是个别聪明人的游戏,而现在曝光的狄克森州立大学的审计报告足以说明:有太多的弄虚作假者曾经搭乘这艘造假之船,然后鱼龙入海,逃匿无迹。翻查以往的新闻发现:不止美国“野鸡大学”大做生意,法国、英国、新加坡都有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文凭工厂”。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向洋人购买假文凭?这跟取巧中弥漫的“洋文凭崇拜”大有关系。打从百多年前前洋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王朝的国门,饱受列强欺凌的历史不经意间把崇洋媚外的种子撒在了很多中国人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科技文明再度震撼了封闭已久的国人,走出去的留学生和引进来的新技术、新理念为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下,对外国大学和海外文凭的好感几乎成了我们的下意识。

然而,在一浪又一浪的留学热中,某些心术不正的人开始从中觅到“商机”。国内外的文凭贩子勾结起来,给那些渴望洋文凭又无法通过自身实力获取洋文凭的人提供服务。他们不需要通晓洋文,甚至不需要漂洋过海,只消有足够的金钱,就能完成学历“镀金”。“洋文凭”在手,他们身价倍增,有关系的立刻就能获取高职,即使没有关系,也会骗倒眼红的单位,得到就业的机会。说到底,正是因为一些国家职场中有畸形的需求,才有了欧美各国的“文凭工厂”不断滋生。

另外,国内的一些大学也间接地以自身信誉为“文凭工厂”背书。狄克森州立大学这样的“野鸡大学”,竟然与多家中国高校有合作关系,其中不乏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而且,狄克森州立大学甚至出现在了教育部公布的美国名校之列。不知道教育部门和各所高校是如何审核这所学校的成色的,当它们都堂而皇之地为之摇旗呐喊时,普通用人单位想识别其虚实也难。

“野鸡大学”大行其道,跟美国政府监管不力有很大关系。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用假洋文凭瞒天过海之辈可以收收心了,地球是圆的,你们再想利用遥远的距离来造假骗人没那么容易了。而教育部和各高校更是要睁大眼睛,仔细识别大洋彼岸披着羊皮的狼,及时地向社会公布这些“野鸡大学”的真面目。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再高明的骗术也经不起公众的围观,当“文凭工厂”名录出现在报章和每家用人单位的案头,它们就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周行

文物拍卖乱象折射行业人才危机

让外国「野鸡大学」暴露在阳光下